

在孩童的欢声笑语中,老人们聊天、散步,怡然自得……

“老幼共托”新模式渐兴

一处设计温馨的现代化园区内,在孩童的欢声笑语中,老人们聊天、散步,怡然自得……像这样“一老一小”和谐共处的“老幼共托”新场景,在一些城市越来越多。

当前,不少幼儿园遭遇“入园难”变“招生荒”的经营困境。部分民营幼儿园瞄准养老服务,“老本行”和“新趋势”一起抓,“老幼共托”应运而生,也成为解决“一老一小”照护难题的新答案。

“老幼共托”模式渐兴

从去年开始,招生越来越难,经营着11家幼儿园的小金牛教育集团董事长于波不停思考出路。“我想过直接关门,但手底下还有300多个员工,最长的跟着我们干了21年。”于波说,他得“活下去”。

多番考量后,于波决定转型做养老机构。5月下旬,位于山东济宁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正式运营。上午养生休闲,下午书法绘画……老人和孩子一样有了“课程表”。

“运营以来,已有60多名老人加入‘托老所’。”小金牛教育集团总园长崔瑾说,进园后右转是幼儿园,左转是“托老所”,老人和孩子在同一空间活动,“托老所”提供休闲娱乐、智慧养老、膳食餐饮等服务。

在全国范围内,类似尝试正在进行。所谓“老幼共托”,是将托老与托幼服务相融合,通过在同一空间下进行老幼照料、代际

学习和互动交流,缓解家庭对于“一老一小”的后顾之忧。

在山西,原小雨点幼儿园坐落在太原市柳巷。现在,这里中午为孩子提供“小饭桌”和午休服务,上午和下午变身老年活动中心,迎来上兴趣课的老人。负责人李秀玲介绍,兴趣课包括舞蹈、模特、书画等,由本地一家中老年教育机构的老师授课。

“红梅花开,朵朵放光彩……”在深圳航城街道三围社区长者服务站,几名老人一边使用远红外理疗仪灸腿,一边用话筒唱歌;旁边就是深业幸福家航城街道托育园。

深圳航城街道三围社区长者服务站和深业幸福家航城街道托育园同在一栋建筑内,两个空间相通相融。养老网点为老人提供短期托养、康复训练、助餐助浴、老年大学、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托育园为0至3岁的孩子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科学育儿亲子课等服务。

类似“老幼共托”新模式不仅适用于幼儿园转型,在新生儿人口数量保持一定增长的大城市,也有助于提升空间利用效率,满足代际融合需求、减轻老人带娃压力。

希望与挑战并存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7.44万所。对比2022年的数据,全国幼儿园减少1.48万所,在园幼儿数量减少534.57万人。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23

年新增注册9.2万余家“老幼共托”相关企业,同比上涨20.3%。

在于波等人看来,托幼行业正经历寒冬,托老则是一片蓝海,部分幼儿园转型“托老所”优势明显。

于波说,招生情况不好的幼儿园大多位于年轻人较少、生育率较低的老城区,这里恰好是老年人聚集区,幼儿园多年经营的



孩子和老人一起互动

声誉和口碑能吸引稳定客源。

记者在于波的机构采访发现,园内老人除周边社区居民外,更多的是孙子孙女在小金牛幼儿园上学、与幼儿园有“渊源”的老人。

34岁的幼师黄冉坐在老人身边,唠着家常,不时添茶倒水,逗得老人们开怀大笑。在她看来,幼师群体往往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托老与托幼具备一定相似性,如果个人意愿强,转型成

为养老护理员并非难事。

同时,代际融合的需求切实存在。“我早晨把外孙送到托育园,就可以在长者服务站活动。解放了自己,孩子又有专业的老师来照看。”68岁的深圳退休职工刘彩玲(化名)笑着说。

深业幸福家航城街道托育园园长吴璇拿着《“一老一小”代际融合手册》告诉记者,“我们在

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照料,机构运营也更精细化、专业化。目前,能同时照顾老年人和儿童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远远不足,现有护理人员数量和数量均无法满足高质量养老托幼服务的需求。

受访基层干部认为,“老幼共托”机构的盈利模式仍有待市场检验;“老幼共托”机构持续升级,如向医养结合或智慧养老等方向发展,或将成为选择。李秀玲也表示,目前仅靠老年大学课程收费收益很低,机构后期可能会通过组织旅行、举办活动等服务老人。

需总结经验、持续创新

从业者认为,“老幼共托”新模式打破固有隔阂,实现“一老一小”资源共享与代际交流,是对既有社会服务与照护模式的创新探索,也是积极应对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的务实举措。

深圳健康养老学院院长刘鹤根表示,我国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建立“机构、社区、居家”一体化的链式医养模式是提高养老服务质效、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从幼儿园转为‘托老所’并不简单,二者虽有共通之处,但功能仍有不同,需要持续创新,进行精细化管理。”于波说,眼下老幼一体化试点刚刚起步,仍需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持续优化方法。

据新华社

一些地方热衷于运用考核检查指标应对千头万绪的基层工作

“指标越多、实效越差”的怪圈

考核检查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基本方法,适当精准的考核能更好推动工作落实,激励鞭策干部担当作为。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热衷于运用考核检查指标应对千头万绪的基层工作,出现数据达标、治理失效的现象,甚至陷入“指标越多、实效越差”的怪圈。

一些考核检查指标难以实现治理效果

推动殡葬改革等移风易俗事项长期是农村地区的一项重点工作。在中部多个乡镇工作20余年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谈起当地的“火化率”考核:“村里有人去世,乡村干部要盯着人家去火化。乡村干部软磨硬泡做工作,才能完成火化任务。”

倡导火葬的一大目的是减少因土葬造成的土地占用,实际上,逝者火化后,当地一些亲属仍会将骨灰重新入棺土葬,照样占用土地资源。

在基层工作中,考核指标与考核目的不匹配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财税指标考核,多名县区干部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提及完成财税指标比较困难,一些地方搞起“总部经济”,以优惠税收政策吸引企业在当地注册公司,虽然没有实际生产经营

活动,却可以将部分税费缴在当地,让当地财税指标“好看”。“企业肯定不会白来折腾,有的地方许诺税收返还80%。”北方一名县级干部说,这就导致当地没落到好处,无形中造成无底线减税的恶性竞争。

有的检查安排不合理,也容易导致结果失真、工作失效。基层反映,一些地方发生安全事故后,往往急匆匆开展安全排查,要求短时间内摸排清楚全域范围内安全隐患。“拿房屋安全排

找到足够的专业力量,只能动员乡村党员干部全体上阵。“基层干部咋确定是不是危房?只能靠感觉。最后排查率达到100%,但结果准确度可想而知。”

一些考核检查指标成了“卸责管道”

在考核检查过细过急的同时,一些事项设置本身也不合理。比如信访稳定考核,虽然信

作,否则可能面临追责。

“只是因为信访人户籍地在这儿,我们迫于考核和问责压力,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去做好稳控工作。但最终很难帮助其解决在其他地方发生的实际问题,给不了对方一个满意的说法。”中部一名镇党委书记说,一些部门三令五申,要求乡镇稳住反映问题的人,但乡镇不是矛盾产生地,“本是为了追求社会稳定,最终却成了信访数据维稳”。

受访干部认为,要警惕一些领域陷入“考核越多,标准越高,问责越急,结果越假”的怪圈。有的上级部门借考核之手,将属于本部门的责任推卸到基层,不管权责是否匹配、人员是否专业,对考核指标一放了之、一审了之,将治理决策简化为考核把关,这不应该是基层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常态。

“工作期限紧,乡村两级难以高标准完成工作,有时候基本数据都统计不过来。”北方地区一名镇领导说,县里一些职能部门与乡镇本是平级,不存在领导关系,但各项指标层层下压之下,它们对乡镇的“指导”变成“领导”,把乡镇“协助”变成“承办”。基层为了在短时间内展示工作成绩,又习惯“自我加压”,容易使焦虑心态在基层环境中“传染”。

让基层掌握工作主动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严格控制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总量,提高调研质量,下大气力解决过频过繁问题”,“制定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中央此前明确要求,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村(社区)权责事项,并为权责事项以外委托工作提供相应支持。未经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各职能部门不得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乡镇(街道)、村(社区)承担。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试图通过严厉问责,用庞杂指标体系来推进基层治理,就会出现指标代替目标,形式主义泛滥,以及有限治理资源浪费的问题。

“从基层角度看,一些考核检查指标失灵,根本原因是乡镇缺乏乡镇自身工作的主动权、话语权。”一名受访乡镇领导分析,一些上级部门下达的考核任务,在考核制定过程中,乡镇未充分参与,导致对任务目标和预期效果了解不全面,执行时只能被动落实,难以根据本地实际灵活调整优化。据《半月谈》



查举例,上级要求今天安排,后天上报。一个乡镇数万户人家,而且有些村庄交通不便,排查一两户就需花费半天时间。”北方一名镇干部说,危房检测、隐患排查工作本应做在日常,且需要专业人员鉴定,但短时间内很难

访相关规定明确,事项的事发地或有权处理的部门是化解的责任主体,承担主办责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三跨三分离”信访案件,不是本地发生的事,人也不在本地居住,因为是本地户籍,属地就要做好稳控工